

制度之外的权力半径

说起李莲英，都知道他是西太后最得宠的太监。批评西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太监干政的罪名，一般都会落到李莲英头上。但是西太后却一直感到很冤，连声说，她没有宠信过宦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政？

要说也对，的确，你还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说李莲英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况且此人为人也相当低调，虽说有太后的宠信，但为人处世，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则帮人。有宫女评价他说，很像一种梨子，长得不好看，但吃起来很甜。甲午前老佛爷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校阅海军，外面的臣子们，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马屁，可他一个外臣不见，躲在屋子里面，任凭人家怎么拍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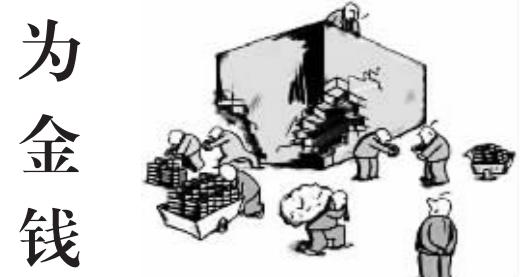
其实，就算李莲英人品非常之好，低调不弄权，但只要他在西太后身边，而且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而言，他就非常有用，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朝堂之上，无论皇帝还是太后，很少能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但是回到宫里，安歇休息之时，未免放松，就算很有城府，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情绪，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竞相结交李莲英的人，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据张荫桓讲，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

被，绿的值钱，送给揽权的西太后，红的差点，送给好好先生东太后。但是，当年外臣送礼，都得经过李莲英的手。一般明白事儿的，都得另备一份稍差一点的礼品，送给李莲英。可是张荫桓不知怎么，却忘记了这个关键的一环，什么也没给李大总管准备。礼物送到了西太后手上，李莲英来了一句：“难为他如此分别的如此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儿，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一句话，说得西太后脸色大变，心中大怒。原来，虽然清廷未必这样讲究，但民间嫡庶的衣饰，以红绿相区别，嫡妻配红，小老婆则配绿。西太后出身嫔妃，跟东太后相比，差了一截，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小老婆，她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张荫桓把绿的宝石送西太后，原本是拍她的马屁，但经李莲英这么一挑拨，他的马屁活生生拍在了马腿上。从此，对张荫桓的恨，就埋在了慈禧的心里。

有权者，尤其是具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的身边人都得罪不起。应该说，在独裁者的权力周围，存在着一个非制度性的权力半径，这个半径内的所有人，都理论上拥有着影响权力的资格。有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有权力者有意把自己的权力渡让给了某些人，比如明朝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原本就是伺候皇帝笔墨的小太监，在太监里面，品级都不高。但是，由于皇帝自己懒得批奏折，就让秉笔太监代笔。有这样的专制独裁权力，就一定有这样的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也就一定会对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

(摘自《企业观察家》6.14 张鸣/文)



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它的制度按金钱至上的原则而设计，它的舆论把金钱第一的观念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深处。应该说，金钱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也很容易让人接受“没钱万万不能”的伪真理。在这种制度和舆论下，人们把追逐金钱当成天经地义的首要任务，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向追逐金钱的独木桥蜂拥而去。于是，对于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人活于世的评价标准变得极为单一：有钱，没钱；钱多，钱少。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特殊性。当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祖上有钱的中国人并不多，到今天，人们也只数到“富二代”。因此，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中国比哪里都拥挤，起跑线上饥饿的人群太多。

金钱成为一切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事不为金钱，在这样的社会简直就是疯子。但我不知道可疑的“一亿”精神病患者中，这样的疯子有多少，更多的应该是为金钱而疯狂的人，或者是被金钱逼疯的人。金钱就是“现代人”这种动物的食物，还永远处于匮乏之中。在金钱的饥饿中，金钱社会的奴隶们抛弃了一切，为了金钱、为了活命而疯狂。南宋有个名叫陈亮的人曾经说：“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所谓的“五贼”是什么？陈亮说：“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

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让陈亮的思想变成主流，即便生意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仁义礼智信”是长久发财的必然之道，抛弃“仁义礼智信”而发财，只是对财富穷凶极恶的抢劫，必定不能长久。当今社会，我们的快乐应该像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不能把金钱变成快乐的唯一内容。而这个心愿是金钱社会不需要的。金钱社会以自由的名义，把金钱当成赛狗场的诱饵，每个参与者都为之疯狂。甚至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只引诱赛狗狂奔的电动兔子是假的，不能吃。

为金钱而疯狂，是金钱社会最乐意看到的结果。

(摘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久前，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工会改造、直选工会主席。结果，来自一线的制造部科长当选主席，而他的顶头上司、前任工会主席则在第一轮即出局。这一事件持续引发了人们关于民主实践的思考。

有民主实践，才有“民众的觉醒”

人们有追求民主的真诚，但缺少民主的“操作能力”，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机会问题。一旦有机会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操作民主，他们就拥有了“可操作的民主”，而不是“可操纵的民主”。

事实上，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工会直选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呼应。两个月前，这家公司曾因员工对公司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不满而发生停工事件，员工提出改选工会的诉求，希望选出一个真正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在选举现场，媒体记者看到，由员工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候选人基本上是普通员工，在竞选演讲过程中，他们有的打出“真诚牌”，有的晒出往年工作“成绩单”，有的则亮出当选后的“规划图”……投票后，计票员在计票板上划“正”字，当场宣布结果。每人一票“挑”工会主席，让该公司员工经历了一次真切的民主历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谈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具备可操作性，要提供实践机会，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操作能力”。发生在深圳的这一次成功的工会直选证明，民主与素质无关，相反还是提升民众素质的必由之路，只要将民主从宏大的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民主实践就会更好地促进“民众的觉醒”，让更多人具备现代公民品格。

(摘自《晶报》6.11)

敌对思维要不得

众视为不顾大局的“挖墙脚者”，视为影响自己形象的“小丑”，甚至视为企图搞垮自己的一小撮“阴谋家”。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政府对民众失去了信任、耐心和宽容，民众的善意言行变成了“恶意攻击”，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便成为常态，甚至导致剧烈的冲突。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思维不无关系，本来是些小事，但由于这种思维作祟，结果酿成大事。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系都害莫大焉。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和平地共处而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瑞士盛产最精确的时间——钟表，但时间的中心却在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村；巴西、德国屡获足球冠军，但足球最初的规则却产生于英国；最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日本、德国，但计算财富的会计行业，最权威的证书却属于英国。古人云：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英国人善于做规矩。规矩能够实行，必须简单。英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并列三个，箱体外没有文字说明，只有图案标识：一个是玻璃瓶，一个纸袋，一个肩屑粒点的点，掷弃者一目了然，知道归类抛物，哪怕不识字的，都会各得其所。在上海，垃圾箱上写着“有机”“无机”的化学名词，表示出科技含量。一个垃圾箱，何必那么学术化呢，老人、小孩自然不知所云，外来农民工也不知所措，像我这样也算读过些书的“知识分子”，充其量“识其字、不知其义”，只能像下注彩票似地抛掷垃圾，这样标识的垃圾桶，应该放在化学系、科技馆门口。

在英国，哪怕伦敦，大多数道路都能泊车，哪怕单行道、哪怕窄路，但收费泊车位的道旁，都有收费器，没有收费人。车主交完费后，收费器会吐出凭证，你将凭证贴在车窗前，巡检者半小时一趟，远远一瞄，就知道谁没有交费，效率极高，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一类是mini，只能电话预约，一类是taxi，可以在马路

上扬招停车载客的。mini车的款式各异，适合私家车载客，该车主必须申请，专管部门批准，交一笔税费，然后在车窗前贴有统一标识，只限于电话预约，不得路途半道上拦截客。

taxi出租公司管理，不管哪个公司的车，款式统一；黑色、方头、枕头面部似的，上海人所谓的老爷车。如果非此款式的车停在路边载客，任何人都会发现，任何人都会举报。众目睽睽，违规者无藏身之地。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首先简单化、直至傻瓜化，这就是英国人的管理思路。一百年前在上海英租界里，黄包车是公共车，漆以黄色，可以路上停车拉客。私家包车漆以黑色，路上载客、接客属于违规，巡捕抓你，上海话“黑车”就出典于此。规则越简单，执行越容易，监督越便利，监督成本越低，违规难度就越高。

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而是做给外行看的，让全社会的相关者都能一目了然，哪怕有些弱智，这是智慧。

让傻瓜也能操作的傻瓜式，是聪明人的杰作。傻瓜就是愚蠢，但傻瓜式却是智慧，英国的管理就是傻瓜式，便于全民执行、监督，这就是这个老牌国家的高妙。

(摘自《廉政瞭望》第10期 李大伟/文)

敌对思维要不得

而倘若“敌对思维”发生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结果是政府将民众视为不顾大局的“挖墙脚者”，视为影响自己形象的“小丑”，甚至视为企图搞垮自己的一小撮“阴谋家”。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政府对民众失去了信任、耐心和宽容，民众的善意言行变成了“恶意攻击”，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便成为常态，甚至导致剧烈的冲突。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思维不无关系，本来是些小事，但由于这种思维作祟，结果酿成大事。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系都害莫大焉。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和平地共处而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摘自《学习时报》6.18 王建勋/文)

1980年中青报点名批评部长事件始末

小厨师勇批大部长

1980年，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面对这样一位“职高权重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20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谈，又到市服务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这一天，报纸同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爹。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部长迅速作检讨 全国为之一震

这篇通报一出，全国舆论的焦点一致对准了特权。清晨，王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日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局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过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报道。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

□ □ □

军队经商喊停事出有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部队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体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对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早就深有感触。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生产经营，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摘自《湘潮》凌辉/文)

□ □ □

片

断

●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政府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一大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史铁生特别喜欢开玩笑，即使是面临绝境，也不忘调侃一下。他生前每年透析要花费25万，由中国协会和北京市政府拨款。除此之外其他巨额的医药、治疗等开销，只能靠史铁生纯文学创作的微薄收益来负担。面对来访的老友李锐，他曾以看透生死的心理调侃自己的经济处境：“老天爷先是让我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瞧咱躺下了，咱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六十块。”(综合《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第5期)

散叶

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利坚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并以此为理

孙中山的国籍之谜

由取得了美国国籍。

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据旧金山洪门大佬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1904年3月，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以孙中山的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

在黄三德等人的积极营救下，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得胜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

但是，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年，孙中山在泰国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胡利。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回复说，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

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

(摘自《广州日报》2011.9.15 徐婧、刘旦/文)

那疑

冷战期间的反美民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最流行的是反美民谣。那时只要你走在大街上，时不时都会传来孩子有节奏的民谣声：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床上吃床上拉。

杜鲁门是什么人，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是侵略朝鲜的美国总统。听这名，杜鲁门，大腹便便的能不是个大坏蛋。美帝都是大坏蛋。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就有了“肯尼

迪，啃皮”的说法。到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说法变成了童谣：“肯尼迪，啃皮，不肯尼迪啃皮。”

1965年，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赵朴初的《某公三哭》：《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于是反对美帝的民谣开始有了文化，也扩大了讽刺目标，从反帝扩展到了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巧了，这帝修反的三个领军人物名字上都带个“